

动结式的早期形式及其判定标准^{*}

胡 敕 瑞

提要 本文根据语义与句法的匹配关系推求动结式的早期形式,求得以“杀”类和“破”类词语充当补语的两种“VCO”以及以“破”类和“熬”类词语充当补语的两种“VOC”。“破”类词语作为早期动结式补语位置上的主要构成成分,其自身兼具“动作”和“性状”两种语义特征;从上古到中古,其“动作”语义特征渐趋减弱而“性状”语义特征日益凸显,因此可把“破”类词语“性状”语义的凸显当作动结式形成的判定标准。

关键词 动结式 早期形式 判定标准 “破”类词语

一 引言

动结式是一种表达动作和结果语义关系的结构形式。作为汉语颇具特色的一种句法结构,动结式并不是自古就有,它有一个产生发展的过程。在动结式产生之前,汉语主要通过使动用法来表达相关概念。然而,动结式何以替代了使动用法,这就牵涉到两个有待回答的问题:1)动结式的早期形式如何形成?2)动结式的早期形式何时出现?

关于动结式的早期形式,看法不一。上古的使动用法一般由单音动词(和部分形容词)充当,而替代它的动结式多由双音结构构成,有人称之为动结式的合用式(周迟明,1958)。合用式包括各种不同的次类,其中何种最早产生,学界也未有统一看法;此外,有人提到隔开式^①也是动结式的一种形式(梅祖麟,1991),但有人认为这类隔开式实在没有资格看作动结式(吴福祥,1998),还有人认为这类隔开式可以算是“准动结式”,否定、肯定、折中的看法都有。

关于动结式出现的时代,说法更多。有人认为先秦就已经产生动结式(如余健萍,1957;周迟明,1958;杨建国,1959),有人认为产生于汉代(如王力,1958;祝敏彻,1963;柳士镇,1992),有人认为产生于六朝(如志村良治,1984;梅祖麟,1991;蒋绍愚,1999),也有人认为产生于唐代(如太田辰夫,1958)。从先秦到唐代,几乎每个时代都有主张者。之所以会有如此多的看法,主要是各家的判定标准不同。

鉴于以上两方面的歧见,本文围绕动结式的早期形式和判定标准试作探讨。为方便表述,文中用了以下符号:C=补语、N=名词或名词性短语、O=宾语、S=主语、Vi=自动词、Vi-t=自动兼他动词、Vt=他动词。

二 动结式的早期形式

为避免主观臆断,在探讨动结式的早期形式时,拟从两方面来作逻辑的推导:一是将语义

^{*} 本文写作承蒙蒋绍愚先生指教,初稿写成后,曹广顺、吴福祥、魏培泉、赵长才诸先生多予鼓励与指正,特此申谢!

和句法联系起来,即从语义和句式的配置关系来说明构成动结式的动词次类最早可能采用的句式;二是由后世往上古推求,即从后世常见的几种动结式来推求早期动结式的原初形式。

2.1 与动结式相关的词类主要是动词,将语义和句法相联系,是要说明不同的动词次类与不同的句式匹配问题。现代汉语通行的动词分类,动词内部首先可以分出他动词(或曰及物动词)和自动词(或曰不及物动词)。他动词最明显的语法特征是后面可以带宾语;自动词则是后面一般不带宾语。但是古代汉语不少自动词也带宾语,古代汉语的动词似乎应分三类:1)通常带宾语的典型他动词,如“杀”、“中(zhòng,射中)”、“得”、“取”等,简称“杀”类;2)通常不带宾语的典型自动词,如“熟”、“沸”、“死”、“燥”等,简称“熟”类;3)兼有自动、他动两用的动词,如“破”、“坏”、“碎”、“折”等,简称“破”类。不同的动词次类具有不同的语义特征,不同的语义特征对应不同的语法功能,而不同的语法功能最终将影响到它们与不同的句式相匹配。

2.1.1 不同的动词次类具有不同的语义特征。“杀”类他动词及物性强,多有施事控管,这类词的语义特征是具有很强的“动作”性;“熟”类自动词及物性弱,多与受事(或当事)相关,这类词的语义特征是具有较强的“性状”性;“破”类词介于前面两者之间,与施事、受事(或当事)都有关,这类词的语义特征是兼具“动作”和“性状”。从语义特征来看,三类动词分别是行为动词、性状动词以及行为兼性状动词。

2.1.2 不同的语义特征对应不同的语法功能。“性状”语义特征强的词适宜作饰语,所以“熟”类词自古至今都可作饰语修饰中心语,“杀”类词则自古至今一般都不能作饰语修饰中心语,而“破”类词由于兼具“性状”语义特征,这类词虽不是自古就可作饰语修饰中心语,后世却可以作饰语修饰中心语;“动作”语义特征强的词语适宜作述语,所以“杀”类词自古至今都可作述语带宾语,“熟”类词自古至今一般都不作述语带宾语,而“破”类词由于兼具“动作”语义特征,后世虽少作述语带宾语,上古却多作述语带宾语。三类不同语义特征的动词,其语法功能判然有别,在作饰语和述语上形成一个显明的互逆级次:

“杀”类 $\longleftrightarrow$ “破”类 $\longleftrightarrow$ “熟”类

从左到右作饰语的比例越来越大,从右到左作述语的比例越来越大。“杀”类动词的动作性强,这势必阻碍其朝饰语方面理解;“熟”类动词的性状性强,这也会阻挠其作述语理解。在这个级次中“破”类动词位居中间,其自身功能有一个互逆的变化,特别值得注意。“破”类动词兼具“动作”和“性状”两种语义特征,但上古主要是“性状”语义附寄于“动作”语义之中,所以上古“破”类词语主要作述语、不作饰语。后来“破”类动词有一个明显的变化:语义上表现为,由“性状”义寄寓于“动作”义逐渐变为“动作”义寄寓于“性状”义;语法上表现为,作述语的功能逐渐让位于作饰语的功能。

2.1.3 三类语义特征不同的动词适用于不同的语法功能,这便导致它们倾向与不同的句式形式相匹配。述宾句偏重于强调施事的动作行为,“动作”语义特征强的动词宜于充当述宾句中表动作行为的述语;主谓句偏重于强调受事(或当事)的结果状态,“性状”语义特征强的动词宜于充当主谓句中表结果状态的谓语。因此,与“杀”类动词相配的基本句式一般是述宾句(“S+V+O”),^②与“熟”类动词相配的基本句式通常是主谓句(“S+V”),例如:

秦人杀子金、子公。(《国语·周语上》)	(熊蹯)未熟。(《左传·宣公二年》)
翩射之,中肘。(《左传·哀公四年》)	水煎沸,竭尽其上。(《韩非子·备内》)
楚之君臣欲得九鼎。(《战国策·东周》)	周共太子死。(《战国策·东周》)
乃命渔人伐蛟取鼉。(《淮南子·时则》)	甲子气燥、浊。(《淮南子·天文》)

“破”类动词兼具“动作”和“性状”两种语义特征,因此与其匹配的基本句式就有述宾句(“S+V+O”)、主谓句(“S+V”)两种,例如:

伯牙破琴。(《吕览·本味》)

军破身死。(《吕览·慎小》)

(君)坏宫室。(《孟子·滕文公下》)

城坏。(《墨子·备穴》)

碎首而死。(《论衡·儒增》)

首碎,不足怪也。(《论衡·儒增》)

或折其骨。(《吕览·为欲》)

剑折且镞。(《吕览·别类》)

“破”类动词既可出现在述宾句中、也可出现在主谓句中。“破”类“S+V+O”与“杀”类“S+V+O”虽同是述宾句,但前者是使动句、句式要通过致使方式才能显示其动作特性,后者不是使动句、句式无须通过致使方式就能显示其动作特性;如果把两种句式中的主语都去掉,虽然都还是述宾短语,但前者容易给人一种偏正短语的错觉(如“破琴”),^③而后者不会给人有丝毫偏正短语的联想(如“取鬣”);由此可见,“杀”类动词比“破”类动词更具“动作”语义特征,而“破”类动词在“动作”义中还兼有“性状”义。“破”类“S+V”与“熟”类“S+V”虽同是主谓句,但后者是当事主语句、句式描写当事自身性状的变化,前者是受事主语句、句式陈述受事遭受某种动作而产生的结果;如果把当事置于其动词后则可转成偏正结构的名词性短语(如“沸水”),而把受事置于其动词后则可变成述宾结构的动词性短语(如“碎首”);^④由此可见,“熟”类词比“破”类词更具“性状”语义特征,而“破”类词在“性状”义中还具“动作”义。“破”类与“杀”类相比近似“熟”类,与“熟”类相比又近似“杀”类,这是“破”类动词兼含“行为”和“性状”语义特征的明证。

2.2 动结式把动作和结果融于一个结构之中,其表达的语义特征是“行为”加“性状”,^⑤三类动词中与其语义特征最为相似的是“破”类动词,也就是具有使动用法的一类动词。这类“破”类动词在充当述语(即作使动用法)时表面上只有一个动核结构,实际上却暗含两个动核结构:一个动核结构是述宾,强调动作行为,语义指向施事;一个动核结构是主谓,强调性状结果,语义指向受事或当事。(范晓,2000)“破”类动词暗含的两个动核结构正好与动结式所表达的语义等值,但是“破”类动词是动作行为和结果状态融合于同一字形之中,而动结式是动作行为和结果状态分别用不同的字形来表达,两者形式上不同。使动用法的“破”类动词为何被动结式代替,这就要溯源到动结式的早期形式。

2.2.1 从理论上来看,动结式的结构可以有四种:他动词+他动词、他动词+自动词、自动词+自动词、自动词+他动词。现代汉语四种结构都有,不过这是历时发展的集合,动结式并非自始就有四种。一般认为,动结式最早产生于带宾语的句法之中,而且动结式的第一成分限于他动词。(王力,1958;梅祖麟,1991)如此看来,只有前两种结构与早期动结式有关,而充任前两种结构后一成分的动词无外乎“杀”、“熟”、“破”三类,下面就以“张三射杀马”、“李四煮熟饭”、“王五打破瓶”为例来反推动结式的早期形式。

1) “张三射杀马”例中的“射杀”分别由两个他动词构成。由于他动词动作性强,一般适宜与述宾句相配(参看2.1.3),所以“射杀”的概念早期当是由两个述宾结构来表达,其整合过程如下(左栏是推导例句,右栏是文献例证,下同):^⑥

A) 张三射马,杀马。 (某)自门间射阳越,杀之。(《左传·定公八年》)

B) 张三射,杀马。 郤至射,而杀之。(《左传·成公十七年》)

C) 张三射杀马。 郤至射杀宦者。(《史记·晋世家》)

由双述宾结构整合为动词连用的单述宾结构,是由于删除重复论元和消除边界所致。A)

“张三”是“射”和“杀”的施事论元,不必重复,可以删除一个,但只能删除后一个,因为施事一般要求居前,且前一个施事也可以统摄后一个施事;B)“马”是“射”和“杀”的受事论元,不必重复,可以删除一个,但只能删除前一个,因为受事一般要求居后,且后一个受事可以兼顾前一个受事;C)“射”和“杀”两个行为动词中间的边界消除,这样就形成了动结式的一种(即“合用式”)源出形式。这个推导过程可以由右栏的历史文献证明,并可码化为: $N1 + Vi1 + N2, Vi2 + N2 \longrightarrow N1 + Vi1, Vi2 + N2 \longrightarrow N1 + Vi1 + Vi2 + N2$ 。

2)“李四煮熟饭”例中的“煮熟”分别由一个他动词和一个自动词构成。由于自动词性状性强,一般适宜与主谓句相配(参看 2.1.3),所以“煮熟”的概念早期当是由一个述宾和一个主谓结构来表达,其整合过程如下:

- | | |
|-------------|----------------------------|
| A) 李四煮饭,饭熟。 | 煮麦,麦熟。(《五十二病方·疽病》) |
| B) 李四煮饭,熟。 | 煮之,孰(熟)。(《五十二病方·(人)病马不间者》) |
| C) 李四煮饭熟。 | 炊一石豆熟。(《齐民要术·作豉法》) |

由一个述宾和一个主谓结构整合为一种新型兼语式,也是由于删除重复论元和消除边界所致。A)“饭”既是述宾结构中的受事论元,又是主谓结构中的当事论元,两者是紧邻的重复形式;B)如果要删除重复形式中的一个,最好删除当事论元,因为受事论元作为他动词的控管对象必须紧随动词,而当事论元可以承前省略;C)“煮饭”的行为和“熟”的结果之间边界消除,这样就形成了动结式的另一种(即“隔开式”)源出形式。这个推导过程也可以由右栏的历史文献证明,并可码化为: $N1 + Vi + N2, N2 + Vi \longrightarrow N1 + Vi + N2, Vi \longrightarrow N1 + Vi + N2 + Vi$ 。

3)“王五打破瓶”例中的“打破”分别由一个他动词和一个自动兼他动的动词构成。由于“破”兼具“动作”和“性状”两种语义特征,所以它既可出现于述宾句、也可出现于主谓句(参看 2.1.3),因此“打破”的概念早期可以有两种表达形式,其一是由两个述宾结构来表达,其整合过程如下:

- | | |
|-------------|--------------------------|
| A) 王五击瓶,破瓶。 | 燕因使乐毅大起兵伐齐,破之。(《战国策·燕策》) |
| B) 王五击,破瓶。 | 上自往击,破信军铜鞮。(《史记·韩信卢绾列传》) |
| C) 王五击破瓶。 | 屋栋摧折,打破水瓮。(后秦《大庄严论》) |

其二是由一个述宾和一个主谓结构来表达,其整合过程如下:

- | | |
|-------------|--------------------------|
| A) 王五击瓶,瓶破。 | 燕攻齐,齐破。(《战国策·齐策》) |
| B) 王五击瓶,破。 | 吴汉击蜀,未破。(《东观汉纪·吴汉传》) |
| C) 王五击瓶破。 | 夫主见妇已爱著此瓶,即打瓶破。(姚秦《出曜经》) |

“打破”的前一种整合过程与“射杀”同(只是“破”是自动兼他动词、与典型的他动词“杀”稍异),可以码化为: $N1 + Vi + N2, Vi-t + N2 \longrightarrow N1 + Vi, Vi-t + N2 \longrightarrow N1 + Vi + Vi-t + N2$;“打破”的后一种整合过程与“煮熟”同(只是“破”是自动兼他动词、与典型的自动词“熟”稍异),可以码化为: $N1 + Vi + N2, N2 + Vi-t \longrightarrow N1 + Vi + N2, Vi-t \longrightarrow N1 + Vi + N2 + Vi-t$ 。两种整合过程分别可由上列右栏的历史文献证明。^⑦

2.2.2 通过删除重复论元、消除边界等句法整合手段,早期动结式形式既有从双述宾结构整合而成的单述宾结构,也有从述宾、主谓结构整合而成的新型兼语式。因此,早期动结式的源出形式就有两式:甲式“V1V2O”,乙式“V1OV2”。两种形式虽由逻辑推导而来,但推导过程都有历史文献的证明,所以不是虚构的。推导过程中的A) B) C)三个环节代表发展的三个阶段,这说明甲、乙两式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历时发展的结果。甲、乙两式虽然形式有异,但整合的方式和形成的时间大致相同,它们的形成是同步的。

对于源自甲式“V1V2O”的“VCO”(即“合用式”),普遍认为是动结式;对于源自乙式“V1OV2”的“VOC”(即“隔开式”)却有异议。从由流及源的推导来看,早期动结式应该有“VCO”、“VOC”两式,只是到了近代“VOC”与“VCO”合流了,但不能因为后世不见就否认它在历史上的存在。

即便承认“VOC”为动结式的一种早期形式,但对于“VOC”的来源也有不同看法。余志鸿(1984)的“顺裁”、“逆裁”说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种,他认为“V及OV不及”(相当于“VOC”)与“V及V不及O”(相当于“VCO”)分别是由“ $V_t + O_1 + V_i + O_2 (O_1 = O_2)$ ”句式经过顺裁(裁去 O_2)和逆裁(裁去 O_1)而成,且认为“不管从传达思想的角度,还是从语法规则理论来考虑,顺裁无论如何得比逆裁早,也就是说先有V及OV不及式,而后才有V及V不及O式。”对于他的这一看法,我们存有几个疑问。首先,他把“V及OV不及”与“V及V不及O”两种动结式归结为源于一种形式的顺裁和逆裁恐怕过于简单化了。“V及OV不及”应来源乙式,“V及V不及O”则来源于甲式,它们并非同出“ $V_t + O_1 + V_i + O_2$ ”之源。其次,虽然不排除有少量“V及OV不及”由“ $V_t + O_1 + V_i + O_2 (O_1 = O_2)$ ”句式经过顺裁(裁去 O_2)而来,但是“V及OV不及”主要是由一个述宾和一个主谓结构整合而来,因为其中的V不及有很多是不作或少作使动用的自动词(如“熟”类),它们后面很少带宾语;再次,认为先有“V及OV不及”式,而后才有“V及V不及O”式显然有悖于语料事实,“VOC”和“VCO”应是同时出现的两种形式,不存在谁先谁后。^⑧

应当承认,早期动结式的源出形式有甲“V1V2O”、乙“V1OV2”两式。“V1V2O”是合用式动结式“VCO”的源出形式,其中的V2主要由“杀”和“破”两类具有他动性的动词成分充当,“熟”类自动词早期一般不充当其中的“V2”;“V1OV2”是隔开式动结式“VOC”的源出形式,其中的“V2”主要由“熟”和“破”两类具有自动性的动词成分充当,^⑨“杀”类他动词早期一般不能充当其中的“V2”。甲式的V2包括“杀”类(V_t)和“破”类(V_i-t),乙式的V2包括“熟”类(V_i)和“破”类(V_i-t),所以甲乙两式又可细分为四式:甲1式 $V_t V_t O$ (即“ V_t 杀O”)、甲2式 $V_t V_i-t O$ (即“ V_t 破O”)、乙1式 $V_t O V_i$ (即“ $V_t O$ 熟”)、乙2式 $V_t O V_i-t$ (即“ $V_t O$ 破”)。

“破”类动词不但兼具甲乙两式,且在甲式中比“杀”类还多,在乙式中也不比“熟”类少,因此“破”类动词所构成的甲乙两式算是早期动结式的主要源出形式。西汉虽已有“击破”、“叩头破”两种形式,但“V1V2O”与“VCO”、“V1OV2”与“VOC”表层形式相似并不代表深层结构相同。“V1V2O”、“V1OV2”何时变成了“VCO”、“VOC”,还需有明确的判定标准来鉴定。

三 动结式的判定标准

关于动结式的形成时代,有些学者不大考虑判定的标准,只是根据现代语感以今律古,于是提出先秦就有动结式,这种看法显然不妥;太田辰夫(1958)提出用自动词“死”替换他动词“杀”的标准来判定动结式的形成,梅祖麟(1991)发展了他的观点,但这一标准也有不足,^⑩最主要的一点是,它只能说明个例,不具有普遍性;蒋绍愚(1999)通过六部典籍,对能出现在补语位置上的动词进行了考察,结果发现汉代使动用法还大量存在、南北朝则已大大减少,因此确定动结式当是南北朝产生,汉代可能已出现个别动结式。蒋先生主要是以“破”类词的他动用法(即使动用法)逐渐衰减(即动作性减弱)作为判定标准,我们不妨以“破”类词的修饰功能(即充当定语)逐渐凸显(即性状性增强)作为判定标准。以“破”类词“性状”义增强作为动结式形成的判定标准,理由有三:1)因为文献常有仿古的用法,“后世的文言,受了先秦典籍的影响,一直在用使动式,所以使动式在口语中衰落的年代不容易直接判断。”(梅祖麟,1991)^⑪

但“性状”义增强并充当饰语是新兴的用法,可以避免这个不足。2)“破”类词的“动作”语义逐渐消减,可以说明连谓结构的后一动词已经没有同等的地位,但“性状”语义的增强与补语的语义关系似乎更为直接。3)“破”类词“动作”语义的减弱,正是因其“性状”语义的增强,后者是前者之因,前者是后者之果。

3.1 然而,“破”类词的“性状”语义为什么会增强?汉语事实显示:1)西汉前后出现了大量具有时序逻辑的V1V2(O)动词连用格式。何乐士(1984)曾以《左传》和《史记》比较,结果发现《左传》中的并列动核复句在《史记》中变成了V1V2(O)动词连用格式,如《左传·僖公五年》“袭虞,灭之。”《史记·晋世家》作“袭灭虞。”又如《左传·成公十六年》“射共王,中目。”《史记·晋世家》作“射中共王目。”2)V1V2(O)结构中的V2多由“破”类动词充当。如《史记》即多见“破”、“坏”、“碎”、“折”等充任V1V2(O)中的V2,其中仅“破”(如“击破”、“攻破”、“袭破”、“伐破”)充任V2的就有51个。西汉大量出现V1V2(O)动词连用格式、而充任V2的又多是“破”类动词,这是历史为“破”类动词“性状”语义增强造就的两个必要条件。“性状”语义的凸显只有在动词连用结构广泛出现之后才有可能实现,并且也只有在兼有“动作”、“性状”两种语义特征的“破”类动词充当V2时才能最终实现。

汉代由“破”类动词充任V2的动词连用形式特别多,由于“破”类动词兼有“动作”、“性状”两种语义特征,所以当其位于另一他动词后充任V2时,其“动作”语义特征就有可能与前面他动词的“动作”语义特征相重合,于是语义不可避免会发生整合。^⑫整合的结果是“破”类动词的“动作”语义特征成为冗余并最终消失,而“性状”语义特征得到凸显。图示如下:

[动作] + [[动作] + [性状]] → [动作] + [性状]

于是原本属于连谓结构的V1V2(O),随着V2语义的变化(即“性状”语义的凸显、“动作”语义的消退),连谓结构就有可能被重新分析为动补结构的VC(O);与此同时,当“破”类词单独出现在名词性成分前时,其“动作”语义特征也渐被忽略,而“性状”语义特征则被凸显。于是使动用法的述语角色悄然退场,而作饰语的定语角色纷纷上场。如果能够证明“破”类词在何时开始充当饰语(即作定语),也就可以证明V1V2(O)何时开始变成了VC(O),所以判定动结式产生的标准应聚焦在“破”类词作饰语上。

标准既已确立,有待证实的是:“破”类词的语义是否真的发生了变化?它们作饰语何时开始出现?由于西汉前后才大量出现动词连用结构,所以可以选择《史记》、《淮南子》两部西汉典籍来和其后的语料进行对比,看看“破”类词是否果真在其后的语料中发生了语义变化。限于篇幅,下面只讨论“破”、“坏”、“碎”、“折”四个词语。

《史记》有“破”593个,只有1例“破(国)”是饰语,^⑬其余全作述语;《淮南子》有“破”45个,全作述语。两书中有些“破”作述语的述宾结构在中古却变成了作饰语的偏正结构,例如:

- | | |
|----|--------------------------------------|
| 破国 | 战胜以骄主,破国以尊臣。(《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
| 破国 | 多少亡家、破国。(姚秦《出曜经》) |
| 破车 | 所谓兼国有地者,伏尸数十万,破车以千百数。(《淮南子·览冥》) |
| 破车 | 譬如痴人、破车、迟牛,欲过险道甚难可过。(东晋《大陀罗尼神咒经》) |
| 破舟 | 木击折轆,水戾破舟,不怨木石而罪巧拙者,知故不载焉。(《淮南子·主术》) |
| 破船 | 是身如芭蕉树,……是身如破船。(西晋《修行道地经》) |
| 破石 | 疾雷破石,阴阳相薄。(《淮南子·说林》) |
| 破石 | 此中非如破器、破石故。(姚秦《四分律》) |

“破”作饰语的例子中古多见,他如:

譬如榆百八爱行,是身为譬如破瓶常漏。(东汉《道地经》)|时须漫那见佛世尊缝补破衣,心怀欢喜。(吴《撰集百缘经》)|又见瓶坏后有破瓦。(后秦《大庄严论经》)|譬如破金刚犹能除灭诸贫困苦。(东晋《大方广佛华严经》)|即以破瓦,盛着左右。(刘宋《摩诃迦叶度贫母经》)|臭秽充满,亦如枯井、空城、破村。(刘宋《转女身经》)|又于岸际见一人乘破船。(《后汉书·东夷列传》)|有愧于叔达,不能不恨于破甑。(《世说新语·黜免》)

《史记》有“坏”46个,都不作饰语;《淮南子》有“坏”15个,也不作饰语。两书中有些“坏”作述语的述宾结构在中古却变成了作饰语的偏正结构,例如:

坏城 江都大暴风从西方来,坏城十二丈。(《史记·孝景本纪》)
坏城 是身为譬如会坏城,多怨家。(东汉《道地经》)
坏宗庙 二世不行此术,而重之以无道,坏宗庙与民。(《史记·秦始皇本纪》)
坏世界 无量成坏世界,无量成坏劫。(元魏《大萨遮尼干子所说经》)
坏里闾 治鼠穴而坏里闾,溃小疱而发瘰疽。(《淮南子·说林》)
坏垣壁 修婆多国时有比丘,于坏垣壁见有伏藏。(后秦《大庄严论经》)
坏塘 坏塘以取龟,发屋而求狸,掘室而求鼠,割唇而治蝻。(《淮南子·说山》)
坏塔 我事缘多,不能修理此之坏塔。(隋《佛本行集经》)

“坏”作饰语的例子中古多见,他如:

是从是相逢会,有是一坏相。(东汉《四帝经》)|为五阴薪从慧明却坏恶火。(东汉《道地经》)|乱须发,载坏弊车,着穿弊履。(东汉《道地经》)|譬若有黠人,拖张海边故坏船补治之。(东汉《道行般若经》)|住在边外朽坏房中。(失译《大方便佛报恩经》)|长发须爪,被坏衣。(吴《佛说义足经》)|扫洒补治故坏塔寺。(姚秦《出曜经》)|亦如旃陀罗女着弊坏衣。(东晋《增一阿含经》)|即便脱去金缕织成珍宝之衣,价直百千两金,而着坏色衲衣。(刘宋《过去现在因果经》)|是名恶心,绮饰坏语。(刘宋《杂阿含经》)|废庭坏殿,基上草生,地气自出之也。(《论衡·讲瑞》)|与刘歆等合战,奔升王宫坏台望之。(《后汉书·耿弇列传》)

《史记》有“碎”2个,都不作饰语;《淮南子》有“碎”7个,也不作饰语。两书中有些“碎”作述语的述宾结构在中古却变成了作饰语的偏正结构,例如:

碎骨 乾咋足以嚼肌碎骨,蹶蹄足以破卢陷匈。(《淮南子·修务》)
碎骨 被山合突打磨之时,身体一切脓血流进,唯碎骨在。(隋《起世经》)
碎脑 云台之高,堕者折脊碎脑,而蚊虻适足以翱翔。(《淮南子·俶真》)
碎头 复行何业,受碎头报。(陈《立世阿毗昙论》)
破碎道德 缪称者,破碎道德之论,差次仁义之分。(《淮南子·要略》)
破碎铁 如似破碎铁,间错于真金。(后秦《大庄严论经》)

“碎”作饰语的例子中古多见,他如:

并持栴檀捣香、蜜捣香、杂碎珍宝,都持散县无竭菩萨及诸菩萨上。(东汉《道行般若经》)|持银钵盛满碎金,或持金钵盛满碎银。(西晋《顶生王故事经》)|不水中若沙地、若碎石地、若盘石上、若被烧地。(东晋《摩诃僧祇律》)|即以碎宝满钵置宝笼中。(东晋《摩诃僧祇律》)|闻食粥捷椎声,欲取钵,正见一聚碎瓦。(东晋《摩诃僧祇律》)|离垢庄严光明照,妙香碎宝悉充满。(东晋《大方广佛华严经》)|有一碎石堕如来上,受此报对脚指血出。(符秦《僧伽罗刹所集经》)|若筒盛碎石摇令作声。(姚秦《四分律》)|有雨碎毘琉璃,有雨碎颇梨。(北齐《大方等大集经》)|唯见脓血一畔滂流一边,犹有碎骨末在。(隋《起世经》)|此是安石碎金。(《世说新语·文学》)

《史记》有“折断”义的“折”19个,没有1例作饰语;《淮南子》有“折断”义的“折”33个,也没有1例作饰语。两书中有些“折”作述语的述宾结构在中古变成了作饰语的偏正结构,例如:

折轴 是故积羽沉舟,群轻折轴,故君子禁于微。(《淮南子·缪称》)

折轴 复次迦叶,譬如折轴无所复用,老亦如是无所复用。(北凉《大般涅槃经》)
 折齿 范雎折胁折齿。(《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
 折牙 如折牙象无复形好。(刘宋《央掘魔罗经》)
 折翅 匈奴折翅伤翼,失援不振。(《史记·淮南衡山列传》)
 折翼 如折翼鸟不能飞行。(北凉《大般涅槃经》)
 折桴 破鼓折桴,驰弓绝弦。(《淮南子·道应》)
 折杖 左捉破器,右持折杖,卑言求哀,从人乞丐。(元魏《贤愚经》)

“折”作饰语的例子中古多见,他如:

如折石破不可还合,是中尽形寿不得犯。(曹魏《羯磨》)|经过险难处然有折轴忧者,道路险难,不遇良伴。(姚秦《出曜经》)|若杀折脚蚊子,不得边罪。(北凉《阿毗昙毗婆沙论》)|野干为折树枝所打喻。(萧齐《百喻经》)|如折角牛不触尧人。(隋《妙法莲华经文句》)|殷豫章与书,送一折角如意以调之。(《世说新语·排调》)|稻者立视之曰:犹应出折臂三公。(《世说新语·术解》)|堪去职之日,乘折辕车,布被囊而已。(《后汉书·张堪传》)

大量“破”类词作饰语的例证说明,从东汉开始这类词的“动作”语义特征逐渐消失而“性状”语义特征纷纷凸显。^⑭上面对比揭举的一些例子,西汉都是述宾结构,其后则可以是偏正结构;表面形式没有变化,内部结构却发生了变化,这种貌似相同而实则不同的结构,是典型的“同形异构”。“同形异构”直观地反映了“破”类词从上古到中古所发生的语义变化,这种语义变化表现在形式上,即上古只有述宾结构的“破城”,却没有偏正结构的“破城”。

3.2 “破城”在上古既然是述宾结构,那么偏正结构“破城”的概念在上古如何表达?上文曾谈到动词的语义特征和句式的匹配关系:与“动作”语义特征相配的典型结构是述宾结构,与“性状”语义特征相配的典型结构是主谓结构。“破”类词在上古兼具“动作”和“性状”语义特征,其“动作”语义特征正是由述宾结构(如“破城”)来表达,而其“性状”语义特征则是由主谓结构(如“城破”)来表达,偏正意义的“破城”上古只能用“城破”这样的主谓结构来表达。上古所有“破”类词的“性状”语义似乎都不像后世那样由偏正结构来表达,而主要是由主谓结构来表达。值得注意的是,上古的一些主谓结构从东汉开始出现了意义类似的偏正结构,^⑮例如:

人来 诸侯人来事秦者,大抵为其主游间于秦耳。(《史记·李斯列传》)
 来人 若有来人从人索物,能不爱惜者,是为布施度无极。(东汉《法镜经》)
 出人 阳州人出,颜高夺人弱弓,籍丘子鉏击之,与一人俱毙。(《左传·定公八年》)
 出人 问城中出人:是何等台?交露七宝服饰姝好乃尔?(东汉《道行般若经》)
 意乱 心烦意乱,不知所从。(《楚辞·卜居》)
 乱意 一者用不欲痛故,二者用避乱意故。(东汉《大安般守意经》)
 性急 西门豹之性急,故佩韦以缓己。(《韩非子·观行》)
 急性 一者为从不耐者为庵;二为急性;三为已后恨;四为无有爱多憎。(东汉《七处三观经》)
 夜半 醉而送之,夜半而遣之。(《左传·哀公十六年》)
 半夜 半夜值月明朗,即便出门,行诣寒林。(东晋《大般涅槃经》)

这些表达类似概念的词语,从上古到中古却是同素异序,主谓结构变成了偏正结构。有趣的是,这些偏正结构中充当饰语的成分在上古几乎都可作使动用,功能和“破”类词相似,上古这类偏正结构只能视为述宾结构,如“来人=使人来”,“出人=使人出”,“乱意=使意乱”。^⑯

主谓结构本是表示“性状”语义的基本结构,东汉以降这类结构却开始转为语义类似的偏正结构。结构的变化,意义非同小可,变化的产生一定是根基于某种语言变化的普遍事实。表达“性状”概念的主谓结构不早不迟在东汉变成了偏正结构,显然与“破”类动词在东汉开始作

饰语有关,而且这种作饰语的现象应相当普遍,否则不至于拖动一种结构发生变化。

与“同形异构”不同,这种语义相同、结构不同的现象,是典型的“同义异构”。“同形异构”和“同义异构”说明,从上古到中古,有些述宾结构变成了偏正结构、有些主谓结构变成了偏正结构。祝敏彻(2003)注意到汉代大量的连动结构到六朝多不复存在、同形的连动结构都变成了动结式。这一变化正好与“破”类词语的述宾结构变成偏正结构、主谓结构变成偏正结构同步。这说明东汉开始“破”类词的语义的确发生了重大变化,^①这一变化不但是动结式产生的直接原因,也是动结式产生的明显标志。

3.3 “破”类词作饰语的现象东汉以后越来越多,其“性状”语义越来越强,这不但使由“破”类动词充任 V2 的“V1V2O”演化为合用式动结式,同时也引起“破”类动词充任 V2 的“V1OV2”成为了隔开式动结式,中古两式并存。例如:

打头破(后秦《出曜经》)

打破头(萧齐《百喻经》)

打外道齿折(后秦《十诵律》)

打折其脚(元魏《贤愚经》)

无独有偶,在“VOC”动结式形成的同时,还出现了“VO 使/令 C”形式。这两种形式关系密切,有很多相似之处。首先,“VO 使/令 C”表达的意义与“VOC”基本相同,甚至在同一种作品中两种结构都可见到,如《增壹阿含经》既有“饮水尽”,也有“饮水使尽”;其次,能够进入“VO 使/令 C”的词除了“破”类具有使动用法的词外,还有很少用于使动用法的“熟”类词,这与进入“VOC”中的词语类别完全相同;再次,“VO 使/令 C”与“VOC”几乎同时在东汉产生,盛行于整个中古时期,最后与“VOC”一起在近代销声匿迹。“VO 使/令 C”可以说是“VOC”的一种有标记形式。然而,既有新兴“VOC”式,为什么还会有“VO 使/令 C”这种有标记形式?是否可以这样推测,这种有标记形式的出现是因为“VOC”中的 C 不少是来自本可表使动用法的动词,汉代由于这类动词的“动作”意义(即致使意义)渐趋消亡而只剩“性状”意义,添加“使/令”标记可以唤起它的原义;此外,因为“VOC”是由一个述宾和一个主谓结构整合而来,形式上这种结构与兼语式相同,可是实质上是隔开式的动结式,为了与兼语式区分,于是就用“使/令”标记将其界限划清。标记的作用或是为了使隐而不明的原义得到彰显,或是为了使有纠葛的结构划清界限。如果推理成立,那么这种“VO 使/令 C”结构在东汉的出现倒可作为“VOC”动结式产生的一个佐证。

“杀”类他动词很少有作饰语的用法,由其充任 V2 的甲 1 式而形成的动结式就无法用其充当饰语的标准来判定。不过,由“杀”类动词充任 V2 的甲 1 式而形成的动结式数量比由“破”类动词充任 V2 的甲 2 式而形成的动结式要少,而且这类动结式形成的时间似乎也要晚。所以,可以认为“V 杀”类动结式的形成是受了“V 破”类动结式的影响。“杀”类和“破”类都是充当“V1V2O”式中的“V2”,随着“破”类“性状”语义凸显而转成动结式,处于同样位置的“杀”类语义也可能虚化,最后也变成了动结式。

“熟”类自动词上古就有作饰语的用法,由其充任 V2 的乙 1 式是不是在上古就已经变成了动结式呢?从语料来看,“熟”类动词充当“V1OV2”中的 V2 不会比“破”类动词晚,《左传》已有“射之死”、“射之殪”之类的结构。但是,这类“V1OV2”决不是“VOC”,因为这类结构在 O 后可以停顿,有时 V2 前还可以有副词修饰,如“击人尽殪”(《国语·周语》)。“熟”类乙 1 式变成动结式,也应是受了“破”类乙 2 式变成动结式的影响。由于中古“破”类词的“性状”语义增强,V2 逐渐失去作述语的功能而融入到前一个结构中,O 后的边界被消除,于是形成了动结式。受其影响,充任“V1OV2”中 V2 的“熟”类词也与其前的结构融为一体,O 后的边界被消

除,最终也成了动结式。

“破”类词充任补语的动结式最早形成,受其影响,由“杀”类和“熟”类充任补语的动结式也类推而成。而“破”类动结式的形成,关键在于其语义在中古发生了变化,“破”类词在东汉译经中已有不少作饰语的用法,东汉以降“破”类词作饰语大量涌现。这种现象正好和“破”类动词使动用法的消减对应,“破”类词的功能一涨一消,所以既可把“破”类词使动用法的消减当作动结式产生的一个标准,也可把“破”类词修饰语的增多当作动结式产生的一个标准,两条标准并不相违,如果将两者结合,可以相得益彰。本文强调以“破”类词作修饰语为动结式的一个判定标准,不但因为这是一条行之有效的标准,而且也因为这是一条尚未引起重视的标准。通过对“破”类词作饰语的考察,我们相信动结式在东汉业已产生,魏晋南北朝得到发展。

四 余论

通过对动结式早期形式的推求,可以证实动结式的早期形式有“VCO”、“VOC”两种,其中“VCO”源于“破”类和“杀”类词充任V2的“V1V2O”式,“VOC”则源于“破”类和“熟”类词充任V2的“V1OV2”式。通过对动结式判定标准的探讨,可以看到动结式的形成乃是由于“破”类动词“性状”语义增强所致,最早形成的动结式应当是“破”类动词充任补语的“VCO”、“VOC”两式,此后才波及“杀”类和“熟”类词充任补语的“VCO”、“VOC”两式。

早期“熟”类自动词一般不充当“V1V2O”中的“V2”,“杀”类他动词一般不充当“V1OV2”式中的“V2”,但是后世却有“熟”类自动词充当补语的“VCO”式,如“煮熟五谷”(唐《陀罗尼集经》),也有“杀”类他动词充当补语的“VOC”式,如“啄雌鸽杀”(萧齐《百喻经》)。这是两类后起的动结式,不能从原始形式中推导出来,它们的产生也是通过类推而成。由于“杀”类他动词原本只能充当“VCO”中的C,“熟”类自动词原本只能充当“VOC”中的C,而“破”类动词则既能充当“VCO”中的C、又能充当“VOC”中的C,这样就形成了下面一种不对称格局:

“杀”类:“VCO”

“破”类:“VCO” “VOC”

“熟”类: “VOC”

因为“破”类动词兼有他动和自动两用,作为他动词用,它与他动词“杀”类同具“VCO”格式,但是它还有“VOC”格式,通过相因类推,所以后来“杀”类也有了“VOC”格式;作为自动词用,“破”与自动词“熟”同具“VOC”,但它还有“VCO”格式,通过相因类推,后来“熟”类也有了“VCO”格式。类推填满了空格,使得不对称的格局成为了一个完满的系统。因为类推必须是发生在大量用例通行以后,所以类推产生出的新型动结式,可以作为判定动结式成熟的标记。

附 注

① 隔开式也称分用式。(周迟明,1958)

② “杀、中、得、取”等他动词很少有用于表达已然事件的受事主语句的例子,赵长才(2000)通过调查先秦和汉代文献证实了这一点。

③ 这种错觉即结构格式的误判,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重新分析”。

④ “碎首”貌似偏正短语,实际上这种结构在上古汉语中必是述宾短语。

⑤ 这只是就早期动结式的语义特征而言,因为后世随着动结式的发展,其补语并不限于表“性状”。感谢匿名审稿人提醒这点。

⑥ 推导的过程只是就其大概而言,实际过程比这个复杂,譬如有些用“而”连接的形式,其动词所涉论元

不一定相同,有的论元之间还有领属关系。

⑦ 在佛典的同经异译中可以观察到一些整合的事实,如《大明了经》“取水,水尽。”在《道行般若经》中则译为“取(海)水尽。”

⑧ 赵长才(2000)认为“VOC”产生于“VCO”后,这种看法也值得商榷。

⑨ “破”类动词在充当“V1V2O”和“V1OV2”中的V2时内部也有差异,使动用法比例高的一般少作“V1OV2”中的V2,因为使动用法高的动词多出现在述宾结构中充任述语,在整合的结构中更适宜于作“V1V2O”的V2;而使动用法比例低的一般少作“V1V2O”的V2,因为使动用法低的动词多出现在主谓结构中充任谓语,在整合的结构中更适宜于作“V1OV2”中的V2。

⑩ 约而言之,主要有五点:1)“死”上古有作使动的用例,“死”并非自古至今都是自动词,因此“死”替换“杀”不一定符合事实(李平,1984;宋绍年,1994);2)“V死O”应是在“V杀O”变成动结式后通过词汇替换而成,因此以“V死O”作为标准是否有效,颇可怀疑(吴福祥,1998);3)以“V死O”作为判定标准,只对特定的类型起作用,甚至只对特定的词语起作用(赵长才,2003);4)“V杀”使用的历史很长,并不一定为“V死”所代替;且“杀”、“死”语义原本不同,“死”替换“杀”也不具有必然性(魏培泉,2000);5)“V死O”是结果补语不成问题,但是六朝用例很少,宋代以后才广泛使用,因此把它作为标准很成问题。(曹广顺,2002)

⑪ 譬如学界一般认为使动用法中古开始渐趋减少,而魏培泉(2000)则举元魏《正法念处经》用例来说明当时的使动用法未见衰微。

⑫ 曾有学者(如吴福祥,2000;冯胜利,2002)也提到“义素合拢”、“核心偏移”等类似的看法。不过,并不是所有的V2都会发生语义整合,只有原本兼具动作和性状两种语义特征的“破”类词才具有整合的可能,因为其“动作”语义虽被整合,“性状”语义还可独立存在。

⑬ “破”类词作定语最早是出现在“破国”、“破军”这类词语中,不过“破国”、“破军”等偏正结构与“破车”、“破布”等偏正结构尚有差异,前者还含有致使的语义(即“国”和“军”不会自动破),而后者则不一定含致使语义(即“车”和“布”会因自然老化而破),所以“破国”、“破军”中的动作语义特征还可以通过致使性曲折体现出来。换言之,“破国”、“破军”一般还可理解为带有被动意义的“(被)破的国”、“(被)破的军”,而“破车”、“破布”如果不是有意的的外力致使,则不一定理解为带有被动意义的“(被)破的车”、“(被)破的布”。

⑭ 还有一个旁证,《汉语大词典》“破”、“坏”、“碎”、“折”词目下所收的大量偏正词语几乎都是东汉以后的,如“破”作定语的有“破门”、“破面”、“破屋”、“破镜”等31个,除“破国”、“破军”是西汉的例子外,其他都是东汉以后的;“坏”作定语的有“坏人”、“坏色”、“坏衣”、“坏病”等25个,只有“坏木”1例见于《诗经》,但马瑞辰以为“坏”是“痍”的假借字;“碎”作定语的有“碎壁”、“碎花”、“碎金”、“碎玉”等31个,都是中古以后的;“折”(只计“折断”义)作定语的有“折臂”、“折简”、“折辘”、“折札”等4个,也是中古以后的。

⑮ 换言之,中古以后表达“破”类词语的性状义就有了主谓和偏正两种格式,而上古只有主谓一种格式。偏正结构与主谓结构在表达上的等值性,可以通过下面例句的对比窥探一二,如:“复次迦叶,譬如折轴无所复用,老亦如是。”(12,436,2)“复次迦叶,如车轴折不任重载,老亦如是。”(12,678,2)

⑯ 太田辰夫(1958:196)指出“在古代汉语中自动、他动两用动词很多。但是时代往后,产生了两用动词固定为自动词的倾向。”我们认为,这个两用动词固定为自动词的时代与同形的述宾结构转为偏正结构的时代是一致的。

⑰ 中古产生了一个不表特定动作语义(类似于近代汉语“搞”)的泛用动词“打”,如:佛典多见“打破”、“打坏”、“打碎”、“打折”等用例。这是“破”类动词的动作语义消减的又一佐证,因为“破”类动词动作意义的丧失,所以才有必要在其前加上一个泛用动词“打”。请比较下面两句:“汝坏灵鹫山”(2,382,1)、“打坏正法山”(2,178,2)前句单用“坏”为古用法,后句用“打坏”为新用法,添加一个“打”似乎暗示“坏”已是一个仅表性状义的词。

参考文献

曹广顺 2002 《中古译经与中古汉语语法史研究》(未刊),“汉文佛典语言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

- 曹国安 1998 《使成式产生时期的确认》,《湖南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第1期。
- 范晓 2000 《论致使结构》,《语法研究和探索》(十),商务印书馆。
- 冯胜利 2002 《汉语动补结构来源的句法分析》,《语言学论丛》(第二十六辑),商务印书馆。
- 郭锐 1995 《述结式的配价结构与成分的整合》,《现代汉语配价语法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 何乐士 1984 《从〈左传〉和〈史记〉的比较看〈史记〉的动补式》,《东岳论丛》第4期。
- 蒋绍愚 1999 《汉语使动式产生的时代》,《国学研究》(第六卷),北京大学出版社。
- 2003 《魏晋南北朝的“述宾补”式述补结构》,《国学研究》(第十二卷),北京大学出版社。
- 李平 1984 《〈世说新语〉和〈百喻经〉中的动补结构》,《语言学论丛》(第十四辑),商务印书馆。
- 李志兵 1990 《汉语使成式的形成》,《古汉语研究》第3期。
- 李佐丰 1983 《先秦汉语的自动词及其使动用法》,《语言学论丛》(第十辑),商务印书馆。
- 梁银峰 2001 《先秦汉语的新兼语式——兼论结果补语的起源》,《中国语文》第4期。
- 刘承慧 1999 《试论使成式的来源及其成因》,《国学研究》(第六卷),北京大学出版社。
- 柳士镇 1992 《魏晋南北朝历史语法》,南京大学出版社。
- 梅祖麟 1991 《从汉代的“动、杀”“动、死”来看动补结构的发展》,《语言学论丛》(第十六辑),商务印书馆。
- 缪锦安 1990 《汉语的语义结构和补语形式》,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潘允中 1980 《汉语动补结构的发展》,《中国语文》第1期。
- 沈力 1993 《关于汉语结果复合动词中参项结构的问题》,《语文研究》第3期。
- 施春宏 2003 《动结式的论元结构和配位方式研究》(未刊),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
- 石毓智 2002 《汉语发展史上的双音化趋势和动补结构的产生》,《语言研究》第1期。
- 宋绍年 1994 《汉语结果补语式起源的再探讨》,《古汉语研究》第2期。
- 太田辰夫 1958 《中国语历史文法》(中译本,蒋绍愚、徐昌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 王红旗 1995 《动结式述补结构配价研究》,《现代汉语配价语法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 王力 1957 《汉语史稿》(中册),中华书局。
- 魏培泉 2000 《说中古汉语的使成结构》,《史语所集刊》71本4分,中研院史语所。
- 吴福祥 1998 《试论现代汉语动补结构的来源》,《汉语现状与历史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2000 《关于动补结构“V死O”的来源》,《古汉语研究》第3期。
- 徐丹 2000 《动补结构中的上字与下字》,《语法研究和探索》(十),商务印书馆。
- 2001 《从动补结构的形成看语义对句法结构的影响——兼谈汉语动词语义及功能的分化》,《语文研究》第2期。
- 徐通锵 1998 《自动与使动——汉语语义句法的两种基本句式及其历史演变》,《世界汉语教学》第1期。
- 薛凤生 1996 《古代汉语的动补结构和“以”字短语的语法功能》,《古汉语研究》第2期。
- 杨建国 1959 《补语式发展试探》,《语法论集》(第三集),中华书局。
- 余健萍 1957 《使成式的起源和发展》,《语法论集》(第二集),中华书局。
- 余志鸿 1984 《论古汉语补语的移位》,《语言研究》第1期。
- 赵长才 2000 《汉语述补结构的历时研究》(未刊),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学位论文。
- 志村良治 1984 《中国中世语法史研究》(中译本,江蓝生、白维国译),中华书局,1995。
- 周迟明 1958 《汉语的使动性复式动词》,《山东大学学报》(社科版)第1期。
- 祝敏彻 1963 《使成式的起源和发展》,《兰州大学学报》(社科版)第2期。
- 2003 《再谈使成式(动结式)的产生时代》,《古汉语研究》第2期。

(胡敕瑞 北京大学中文系 100871)

ZHONGGUO YUWEN

CHINESE LANGUAGE

May, 2005

Abstracts of Major Papers in This Issue

Xu, Jiujiu, Associative anaphora in Chinese discourse

Associative anaphora refers to discourse anaphora without a definite anteceden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associative anaphora in Chinese discourse. The author differentiates NP co-reference from NP associative anaphora, establishes the analytic framework for NP anaphora, accordingly, divides associative anaphora into superordinate/hyponymy anaphora and connective anaphora. Based on this, the author analyses the different types of superordinate/hyponymy and connective anaphora, and explores the formation paths of superordinate/hyponymy and connective anaphora in Chinese discourse.

Key words: associative anaphora; discourse anaphora; co-reference

Cao, Hong, On the semantic characteristics of middle constructions in Mandarin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emantic representation of middle constructions (NP + VP + AP) in Mandarin. It proposes that: (i) the implied agent of middle verb is arbitrary referential; (ii) two natures, the stative situation type and the generic meaning proposition can be found in middle constructions; (iii) the sentence initial NP of middle construction is generic with respect to referential meaning; and (iv) the sentence pattern meaning of middle constructions can be generalized as following: whenever some one V NP, the NP will exhibit the state AP.

Key words: middle constructions; semantic representation; implied agent; referential meaning; situation type; sentence pattern meaning

Hu, Chirui, The early forms of resultative construction and the relevant criterion

Based on the matching relation between the meaning and the structure, this paper deduces that the early resultative construction has two forms, which can be further subdivided into four different forms, including two "VCO" forms, for example, *sha* (杀) and *po* (破) function as complements, and two "VOC" forms, for example, *po* and *shu* (熟) function as complements. As the complement of a resultative construction, words such as *po* have both actional and stative meanings. However, from ancient times to medieval times, with the action meaning reduction, the stative meaning of those words became salient gradually. The prominence of their stative meaning is the criterion in the resultative construction judging.

Key words: the resultative construction; the early forms; the criterion of judgment; words of the *po* type

Chang, Song-hing and Kwok Bit-chee, Two types of the comparative construction in Hong Kong Cantonese: Competition and replacement

The native form of the comparative construction in Hong Kong Cantonese is the *guo-*